

心學工夫論：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

作者：陳復

第十節 內聖外王的生命實學

很多人常有如此誤解：關注內在心靈狀態的人或思想，通常都會與世隔絕不問塵事，致使如有哪位心靈的智者發表對社會各種問題的意見，通常就會承受價值不中立的批評。這種觀點來自西洋文化裡曾經在中古時期承受「政教合一」引發不斷的政教衝突，致使當文藝復興而降世俗政權統御機制增強，宗教退隱於世的呼聲就會日漸高漲，再加上工業革命帶來高度的工具理性意識，無法被量化的心靈就逐漸被排擠至邊緣化的處境。在台灣，由於佛教這三十年大盛於世，其教義本就有離世除苦得樂的思想，出家即不與紅塵俗事沾染（尤其政治），本屬不論哪座山門都有的一貫教風，致使心靈被邊緣化的處境更顯得合理（雖然政治工作者都有心靈空虛茫然的時候，而各自與其山門保持友善的關係）。然而，這在中國傳統士人社會來說卻屬反常，儒學的根基就在心性，關注心靈與積極用世從來不是能被割裂的事，否則《大學》說「格致誠正」後再說「修齊治平」就變得無法理解了。傳統士人關注自己的德性涵養，並拿德性涵養出的能量來治理國事，

這是整個文化裡的人都相信，並經過設計落實於政治制度的理想，雖然每個時空裡都會有讀聖賢書不做聖賢事的人，但，制度的保障使得人性的光明面更容易被激發與貫徹，致使德性的涵養長期被當做主流議題，做為一個人能否被眾人信任而得立身處世的準繩。我們因此要澄清：儒學從來就是內聖外王的實學，過問紅塵俗事本來就是這套學問會蘊生的原因，心學更是實學裡的實學，內能蘊生悟性高深的聖賢，外能蘊生治國平亂的能臣，這些豪傑史不絕書。

華人社會百年來變亂不斷，隨著台灣這三十餘年來（大陸這十餘年來）的經濟持續成長，社會暫時獲得休養生息的契機，而使我們應該有機會更成熟思考這個問題：五四運動時期提倡的「民主」與「科學」這兩大議題，隨著兩岸中國的各自埋頭實踐，到底獲得結論沒有？

經由在台灣與大陸的實際體會，敝人覺得：「民主」與「科學」這兩大議題應該已經不是牽動社會發展與否的重點了。說它們不是重點，並不意味著它們已經被擱置，相反地，它們已經相當程度內化至社會各層面，成為現代社會運作的基本素養與態度，這包括常被人視作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掌握科學是其能有效統治的重要工具，適度的民主則能擴大統治的威信，大陸的政府不會認為自己不支持「民主」與「科學」。問題真正的重點，卻在我們已不知不覺把「民主」與「科學」給無線上綱，不能意識它們只是人類生活裡不可或缺的技术環節，而不是人類生活裡不可或缺的根本觀念，致使知識份子在台灣越奮勉去提倡「民

主」與「科學」，「民主」與「科學」帶來的禍害就越嚴重，這其中尤其屬生態環境的破壞在反噬人的生存最讓人觸目心驚，這常假「民主」的名字，夾持「科學」的技術去落實。「科學」確實只是個工具，這個工具能解決一些有關於人類生活或無關於人類生活的技術問題，卻不可能拿來透視人心內在的問題，或說秉持著科學精神就能去過倫理生活，這是不相應的狀況¹。然而，荒謬就在我們已有「科

¹ 胡適對這種狀況肯定有關鍵性的思想影響，他早年就在積極提倡「科學的人生觀」，並希望能做人類人生觀的共識，他說：「拿什麼東西來做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我的答案是：拿今日科學家平心靜氣地，破除成見地，共同承認的『科學的人生觀』來做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他確實已經把科學當做信仰，他說：「我們應該準備替這個新人生觀作長期的奮鬥。我們所謂『奮鬥』，並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統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態度，誠懇的言論，宣傳我們的『新信仰』，繼續不斷的宣傳，要使今日少數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人的信仰。」見《〈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選》，頁 66。這種宣傳的過程，相信卓有成效。他後來還替「科學的人生觀」做界說，區隔出兩個層面的意思，他說：「第一拿科學做人生觀的基礎；第二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見《科學的人生觀》，《胡適演講集（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西元一九八八年遠流三版，《胡適作品集》二十五，頁 193—197。他晚年還在這個角度裡繼續表示我們東方人不該以自己有優越的精神文明自傲，相反地，我們該承認自己文明裡含有的精神實在不多，因為我們沒有科學，而這正是一種具有高度精神的理想主義，他說：「沒有一點這樣透澈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一點這樣的智識上的信念，我們只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途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他認為沒有全面信仰科學，讓它在我們的社會生根，我們無法擺脫被物質環境限制住的落後處境，見《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胡適演講集（二）》，頁 137—143。胡適的觀點背後恐怕還是一種基於功利用途（拿科學來救亡圖存，不論是把科學視作功利用途或內在價值，都還是有功利的性質）纔會產生的心態，這使得科學會被擴張其應用的範圍至無限大，而失去應用的精確性。

學萬能」的宗教信仰，什麼議題都要拿科學來處理，請問當我們現在面對失去意義的文化危機時，如何只能拿科學態度去做研究寫論文，由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或政治學來系統解釋其危機背後的原因？當我們給予各種合理化的詳細討論，難道問題就會被解決嗎？如果真拿科學的態度來說話，科學從來不解決問題，科學只幫人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智慧，不在於科學。

這百年來的變化太過劇烈，我們的問題已經不在欠缺科學的態度，而在凡事都拿著科學的態度去說話，而忘記自己還是個有感情的人，竟然把感情視作毒蛇猛獸，只要帶著感情去說話，就意味著不理性不實際不客觀不學術……，就在這些無限否定裡，我們跟著蒙蔽自己的心門，無法真正帶著「科學」去認知還有其他議題需要拿其他辦法來處理，尤其是跟人有關的議題，尤其是跟生命覺醒有關的議題。我們無須（更不可能）漠視科學的社會價值，然而，我們實不應該過度誇大科學的社會價值，使得人自身的存在價值被漠視，科學的開發能幫忙人拿衛星導航去開車、使用寬頻系統上網、在台北家裡拿手機聯絡北京的公司、電腦即時統計各選區開票結果與發射火箭上火星探索有無外星生命跡象……，它的日新月異能使我們各種物質生活都變得更舒適更便利，卻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什麼是對與錯，正因科學沒有人性，很多人就常利用科學的這層弱點，把自己的人性隱藏在科學的包裝裡去做更具說服性的宣傳，這種「唯科學主義」的態度，隱藏人性更深的問題，卻無法被輕易考察（尤其體現在人文議題的理性闡論過程裡），敝人認為這纔是主張科學精神的真正大敵。相反地，我們應該讓科學回歸其專業的

技術領域儘量發揮，而讓人文的議題因被更真實揭露而獲得更真實討論(這包括發言人自己的情感與其發言背景都屬於被討論的範圍)，如此「各就各位」，纔能避免掉人真實的態度與盲點永遠沒有被釐清的機會，人再無法拿「科學」去做任何主張的障眼法，人纔能誠意面對自己到底在說什麼²。

這是做人這篇論文會如此書寫的重要原因。《大學》經一章如此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的心靈安頓問題纔是根本，如何駕馭科學只是末節，駕馭科學背後的心態本身無法由科學來抉擇，科學只能處理心態經過抉擇後，在應用層面的開拓，如果心靈無法獲得妥善安頓，卻不斷片面強調科學在應用層面的新開拓，如此隱藏心靈真實處境的作法，只有繼續深化利用科學來做錯事的惡果。拿最直接的例證來說，台灣這十餘年來大規模展開教育改革，不斷讓專科學校升格做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做科技大學與科技大學升格做大學，讓台灣的大學院校由五十校大幅擴張至一百五十校(拿台灣的人口與學校數

² 「唯科學主義」相信宇宙萬物的所有方面都能通過科學方法來認識，現代華人社會的學術領域幾乎完全被這種科學信仰主宰，由此產生的論點並輻射至社會各層面，美國人郭穎頤因此寫《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來研究這種極特殊的現象，他說：「中國的唯科學論世界觀的辯護者並不總是科學家或者科學哲學家，他們是一些熱衷於用科學及其引發的價值觀念和假設來詰難、直至最終取代傳統價值主體的知識份子。這樣，唯科學主義可被看作是一種在與科學本身幾乎無關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學威望的一種傾向。在中國，科技的落後更加強了人們對國家富強的盼望，所以，當我們發現中國許多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於科學的巨大熱情時，也就不必驚訝了。」見其書第一章〈現代科學對中國思想的教條影響〉，《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雷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西元一九九五年一月第一版，頁 1。

量相比，應該大學已居世界密度最高)，主事者認為只要學校擴張了，學生都有書念，就沒有競爭壓力的問題了，其結果卻使得大學越增加而大學教育越瓦解，殊不知教育改革的重點當在教育學生關注心性，而不僅是吸收知識而已，如此拿量化的辦法來解決本需由質化探索的問題，這就是某種「唯科學主義」在作祟的惡果，纔會把教育改革當做工程問題來解決³。相同的問題，我們在台灣的政治工作者每天都在高喊「民主」，認為各種政治議題只要由人民投票就能獲得最簡單的解決，殊不知政治議題有時極其繁複，其專業性沒有經過認真思考常很難明白其對錯，做出最適宜的決策，動輒訴諸投票，常會使問題沒有機會釐清，就已因群眾合法的多數暴力而輕率做出判斷，「民主」如果只是拿數人頭的辦法來替換打破頭，這種民主只是合法而不合情與理的暴民政治而已。

最深沈的問題，來自「民主」如果沒有心性的品質做保證，這種民主常只在

³ 郭穎頤說：「唯科學主義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但並不有益於科學本身的進步。對科學家來說，實在是用公式來表示的，它的語言是純數學的形式，而非科學家、文人，則以崇高的日常語言來表達實在。說科學的發現和成就應該崇拜是一回事，而說所有人類的生活和行為都能用純科學的語言來表達完全是另一回事。這麼一種態度是由於把科學證明等同於整個現象界精確的可證實性、把科學的客觀等同於人類努力的客觀性而產生了對科學的崇拜而造成的。因而，人們就把科學作為一種不可能的教條終極性應用於任何最基本的人類情境。」見《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七章〈論戰之後：教條的終結〉，頁 172。教育其本質當屬廣義的心靈涵養的情境（尤其人格教育最屬核心），卻在台灣被當做科學觀念裡極狹義的土木工程來處理，致使已經實施長期的教育改革，其各種改革措施都只在呈現跟學習有關的制度改革，而從未觸摸人格教育的任何議題，而改革十餘年，至今成效低落，民怨沸騰不已，難道沒有暴露主事者只知科學尚不知心性為何物的盲點？

參養目光短淺的人心中的利益，卻無關整個國家大政南針的弘旨。「民主」不該只是利益分配的問題，如果僅停留於此，難怪民主常會傷害沈默者的利益，這個沈默者尤其是我們生活仰賴的自然環境。這就更難怪民主社會裡人與人常要動輒抗爭了，如果你不積極抗爭，誰管你的利益？沒有心性的品質，粗糙的多數人決策常會損害大家的整體利益，但，誰會去管整體利益？台灣這幾年來政治越民主而政治越敗壞，就跟人民毫無心性的品質有絕對關係。因此，體會過民主經驗的我們，已無法如早年的五四大師無條件歌頌民主的有益，我們也不會如某些堅持意識型態的人士堅持東亞或中國無法實踐民主（它畢竟只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操作），我們只是開始意識民主得設立在更高的心性品質，否則即使是號稱最民主的美國，也可能會選舉出很會選舉不會治國，卻靠著窮兵黷武於海外，操縱愛國主義來拉緊選票的總統。包括台灣在內，整個中國人民都尚未有成熟的心性來展開全面的民主，這固然與現在兩岸中國的整體文化水平低落（或者說大幅退化）有關，卻與民族性無關。當人只顧著思索自己的利益，卻不願意思索社會國家整體的利益，甚至生態環境整體的利益（能到這兩個層面去思索，則已經與純粹的利益無關），則主張「民主」會引發社會國家生態環境大規模的災難，敝人每當看見台灣島內已經遍地被只顧利益的人民開挖得滿目瘡痍（只因這是他能聲稱合法「擁有」的土地），就明白天災與人禍至此已經很難區隔。

或許有人會說，只要政府有效管理，這些夾雜人欲的災難都能避免，問題就在台灣已是個「民主」的社會，任何事端只要人民成群結隊由議員帶領去做激烈

抗爭，政府任何出自整體利益的決策最後都會因此屈服，因為這就是民意。如果這種民主經驗放在全大陸去實踐，憑著刁鑽的民風，會如何巨幅改變我們神州的臉孔？由此可知，民主如果沒有經過自覺的心性來做擔保，這種民主實在是生態環境的恐怖統治。我們必須要站在更高的視野來思考這些問題，而開始明白「民主」實在只是蒼生整體福祉的一個環節而已，應該如同前面看待科學般，我們要給予民主更正確與更精確的估價，讓它能被擺放在適合的領域去照顧人民，而不該無限上綱反而醞釀對人民的長期傷害。如果「民主」只是種關於政治運作的技術問題，民國新儒家長期討論儒學能否開出民主就不會是問題⁴，不論其是否來自西洋文化（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獨創，經過十八世紀而降的政治實驗，具有

⁴ 民國新儒家由於多人曾參與推翻清朝的革命（如熊十力與梁漱溟），或曾親身見證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如徐復觀），因此大多數都跟隨時見認為中國傳統政治就是君主專制，並認為儒家思想從沒有在政治制度層面開出真正的外王，因此纔會有後來牟宗三經由「良知坎陷」開出民主做新外王的說法，他們都沒有意識君主政治是在特定歷史條件裡必然的選擇，而其制度的設計自有相應於當日情境的合理性（當然，自然還會有缺失），亦已有聖賢在不同時期奮勉做出不同程度的外王實踐。他們多與深究國史的史學家錢穆的見解大異，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裡說：「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歷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為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歷史上傳統政治也一氣不滿意。因對於歷史上的傳統政治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見第五講〈清代〉，《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五版，頁 153—154。敝人相信實施民主與否只是個技術問題，華人對其往日的文化傳統已經失去共尊共信的信念纔是最根本的問題，民國新儒家由於相信中國的傳統政治就是君主專制，而在不知不覺間對這種信念的瓦解有推波助瀾的狀況，儘管這決不會是他們的本意。

獨特的西歐或美國經驗，我們只要已認知內聖（深刻的心性品質）纔是外王（王道的政治）的保證，則「讓人民自做主宰」的觀念就是展開外王的一條路徑，只要架構相應的政治制度去落實，其絲毫無損於根本。「讓人民自做主宰」的觀念如果沒有心性的元素，則人民永遠無法擺脫被奴役被操縱被剝削的事實，不斷聲稱的「民主」只是被政客玩弄爭取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儒家思想裡的「民本」主張應該要重新獲得重視，讓先覺者有合法的管道去關注蒼生的福祉，導引人民因復見本體而能真做主宰。

因此，我們應該設計制度去恢復傳統中國裡的士人階層，先產生一批覺醒而有熱忱去淑世的智者與志者，賦與他們更直接參與國政的機會，如此思考中國未來的前景較能擺脫現實利益的控制，且不受限於知識份子腦海裡執著的意識型態，而重啟文化的中國盛世。這些外王層面的議題千絲萬端，本不是這篇論文要思考的重點，敝人只是冀圖讓讀者能因此體會：發展心學，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甚至全人類，都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我們正站在是否要繼續受資本主義的豢養，不惜毀滅掉地球的生態環境的轉捩點，聖嬰引發的全球氣候反常，已經不斷在對依舊深陷在個人利益糾葛無法自拔的我們示警。人類的政治制度固然已不可能退回往日賢昏品質不一的君主政治，更不可能繼續堅持這種將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民主政治，至於能重新修補「天」與「人」的關係而架構的新政治，其該有的觀念路徑與操作辦法，敝人都覺得只有先掌握心學，先有內聖的把持，纔能更沈穩去鋪陳其前景。轉換自牟宗三的講法，敝人的心學工夫論，實屬「由下面說

上去」的路徑，有工夫論做涵養本體的階梯，如此修身就是很真實的在日常生活裡做工夫，而不會抱住僵化的道德教條變做心性的死人，或空論抽象概念而精神卻毫不相干。工夫論就是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敝人深信儒學將會因這個路徑而甦醒復生，陽明子距離現在已經有五百年，自周公提倡「治禮作樂」，中華文化的更化復興已歷六回，希望此番我們對儒學的招魂附體重蘊人間，能使中華文化對整個世界負起大責任，聖王精神不死，則人類尚有前程……

心學紀元五年，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日未時本文寫就，七月九日亥時註釋寫就，全文完稿於風城臥龍新野齋，感謝華梵大學中文系召開「第二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提供殊勝因緣使野人獻璧。

經典書目

《尚書》，《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藍燈文化公司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藍燈文化公司

《禮記》，《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藍燈文化公司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藍燈文化公司

《孟子》，《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藍燈文化公司

《老子》，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西元二〇〇〇

年三月修訂版

《史記》，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國七十

五年九月學人版

《說文解字》，清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九版

《朱子大全》，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台二版

《朱子語類》，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台三版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大安出版社，西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陸九淵集》，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年一月初版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傳習錄》，《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六

年四月再版